



徐积锴先生一家六口合影。

□宋遂良

宋仁宗赵祯12岁亲政,53岁驾崩,在位42年,是宋代在位最长的皇帝,所以《清平乐》有条件集中展现一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文人。粗略地算一下就有晏殊、欧阳修、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、苏舜钦、石介、张先、文彦博、夏竦、蔡襄、司马光、王安石、曾巩、包拯、苏轼、苏辙等多人。实属难得。

电视剧根据这些文人的政治态度特别是才情、人品,着重描写了清雅冲淡的晏殊、忧乐天下的范仲淹、才情旷达的欧阳修和保守直物的司马光这四个代表人物。

“太平宰相”晏殊早中状元,曾为帝师,是个老资格。可贵的是他从不专权任性,富裕的物质生活和从容的精神境界已使他摆脱了功名利禄的羁绊,归于宁静致远。他力劝官家“顾全大局”不去见生母以免激起太后的不满,然后又故意以朝堂失礼的过错自请外放,以平息太后的怨怒。在激烈的朋党之争中,他不偏袒自己栽培提携的韩琦、欧阳修、富弼等亲信,恪守“治国如执秤”的公正,豁达大度。看看他在《蝶恋花》一词中表现的“独上高楼”的孤独,“望尽天涯路”的寂寞,“山高水阔”的自勉,就知道他是一位厚重内敛、儒雅亲和的文人。

范仲淹出身贫苦,随性豁达。他被晏殊推荐去应天书院执教时,因斗笠布衣被讥讽围困。他被贬相庐后赤足蹀入河中掬水自饮,高吟“使君无一事,心共白云空”的诗句,浪漫而清高。他正直无私,多次犯颜直谏,独排众议,治军经武,淡泊名利,“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”,忧乐安天下。他一贬河中通判,朋友们送他出京,称赞他“此行极光”;二贬睦州知州,送行者又赞他“此行愈光”;三贬饶州知州时,又被赞为“尤光”。三贬三光,天下无双。《清平乐》是把把他当作一代文人的精神领袖来塑造的。演员的表演也恰到好处。

欧阳修是一个性情中人,锋芒毕露,不知设防。当他在朝堂上面对群臣揭发他与外甥女有染时,急得赌咒发誓、满头大汗,当他在大街上被落第考生诬他舞弊并加以奚落时,显得狼狈不堪,难以应对(幸亏年轻的苏轼仗义为他解了围)。欧阳修心地坦荡,爱惜人才,王安石、曾巩、苏轼、苏辙、文彦博、司马光、韩琦、包拯等都受到过他的栽培、保护或推荐,被誉为“千古伯乐”。欧阳修修《新唐书》《新五代史》,也是金石、诗话、插花等艺术的开创者。他是个有情趣的人,不然写不出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这样的诗句啊。

司马光是个正人君子,保守派,固执偏激。年少时,头上就戴着“砸缸”的光环。他饱读诗书,循规蹈矩。《清平乐》把他塑造成一个忠君守制、正直不阿的儒家传统承继者。他经常引经据典,从权循例,以牵衣拦道、长跪不起、摘冠明志、以头触地等方式实行“死谏”,逼得官家气急败坏,以赢得自己的令名清誉。当他跪地死缠官家,要他杀掉梁怀吉时,福康公主质问他:你是不是觉得爱恨嗔痴都是有罪的,都该杀?这是问到了要害。司马光曾赞扬一个因守礼闭门不出被活活烧死的妇人。他把礼教看得比生命还重要,正是以礼杀人。尽管他自己是个道德模范,但压抑和放纵同样不是正常的人性,不可提倡。电视剧多少有点渲染了司马光的愚忠和假道学,但这也是艺术的需要。

以范仲淹、欧阳修、韩琦为首的改革派(包括因公款聚宴被弹劾革职出京的苏舜钦、王益柔等),以吕夷简、王拱辰、夏竦为首的保守派(司马光也可包括在内),和以晏殊、富弼、文彦博为代表的中间派之间在朝堂、内阁、官家面前以及酒肆私宅中无数次的辩论、攻讦、质问、对掐,是《清平乐》中最好看的剧情之一。这些文人之间言辞之激烈,争论之火爆,如同你死我活、不共戴天,也把语言推向了极致。

这种辩论之能够正常进行,得益于宋代重文轻武的体制和皇帝开诚纳谏、不罚言官的传统,形成官家与士大夫对国家的“共治”,官家管着所有的大臣,所有的大臣又管着官家,从内而外地对皇权有了某种制约。

因为党争、政见、人事、后宫等错综复杂的关系,造成连晏殊、范仲淹、欧阳修这样的大臣都多次被贬。这些文人迁客多愁善感,受到委屈和不公正的处置,郁郁寡欢时,文学就来叩门了。《岳阳楼记》《醉翁亭记》《沧浪亭记》以及像“碧云天,黄叶地”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”“人生多求复多怨”“镇日无心扫黛眉,相酌相劝忍分离”这样数不清的诗词,就成了我们上中小学时要欣赏、学习、默写、背诵的负担。

【文化杂谈】

## 宋代的文人们

——再谈电视剧《清平乐》

样就有了两套,将一套寄香港,一套自己留下做研究用。虞先生得到后,复印了一份给我。再后来,虞先生将这两册日记整理出来,连同其他四种,出版了《徐志摩未刊日记(外四种)》。我的《全集》即据虞的整理本录入。

《徐志摩全集》编完,送了出版社,我就不管了。腾出手来,接着写《徐志摩传》。临到出版的时候,编辑问,能不能有张别处没有用过的徐志摩的照片,显得我们的书有些新意?于是又给积锴先生去信,提出这个要求。有了前面两三次通信,老先生对我的印象还不错,见《徐志摩传》要出版了,这个忙不能不帮。可是,在他的相册里,确实没有他父亲的照片,过意不去,只好寄来两张别的照片,一张是他的全身照,在庐山,坐在一块石头上照的。正好徐志摩也有这么一张照片,对比之下,还有点意思。另一张是他的四个儿女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从中国香港来到美国,跟他夫妇一起,一家六口在一座大厦前照的。照片上能看出,他的夫人张粹文女士真是一等一的美人。

此照片可印证一件逸事。积锴先生到了婚配年龄,母亲问他要找个什么样的女孩子,他的回答,跟他父亲是一个路数,说“我只对漂亮的姑娘感兴趣”。他的母亲当时是上海女子储蓄银行的副总,办这个事不难,便在朋友圈里,给儿子介绍了这个绝顶漂亮的名门闺秀。这还不够,后来又送儿子带上新媳妇赴美留学,读了前夫曾读过的哥伦比亚大学。

这两张照片,都是原照,且能看出是从相册上揭下来的。背后四角,均有黑色的纸屑。

《徐志摩传》的前面要放几张照片,单独放徐积锴的不好,便放了这张全家福。没过多久,广东教育出版社让我编一本《徐志摩画传》,积锴先生的那张单人照也派上了用场。

《徐志摩全集》送给出版社,一放就是好几年,临到要出的时候,我想,是不是可以让积锴先生在前面写上几句话,算是小序。台湾版的《全集》前面,有他的小序,不长而文字甚佳。去信问了,老先生说他年事已高,“出国以来已五十余载,平时除偶尔与朋友书信往来以外颇少应用,中文字已续渐忘却,不要说写文章了。”

《徐志摩传》是2000年出版的,出来后曾寄给积锴先生。天津版的《徐志摩全集》拖到2005年才出来,按说也该寄给老先生,没寄,是我以为他已经去世了。此番购得《志在摩登》才知道,积锴先生是2007年去世的。

这就要说到与徐志摩长孙徐善曾先生的交往了。2012年6月,留法的张葵女士联络中科院院士孙枢等人,在济南开了个徐志摩国际研讨会,邀请的来宾里,有徐善曾先生。张葵女士问我,能不能送给善曾先生一套我编的《徐志摩全集》?不曾犹豫,当下就答应了。实际上,出版多年,我已没有多余的书,手边的一套,上面有我的勾画增补,不能送人。市面上又没有卖的,想起女儿家有一套,便拿来带到济南。上面有写给儿女夫妇的题签,也顾不得了。在会上,作为一项议程,送给徐善曾先生,算是补上了没有给积锴先生寄书的遗憾。

会上,善曾先生还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一段话,全是英文,回来叫人译给我听,只是些感谢的话。

我与积锴先生的通信,共有五通。其中一通,送给了李文哉还是虞坤林,记不清了。印象中好像是帮了我个忙,又无以回报,便将积锴先生的一通信顺手给了。那个时候人们之间多是书信交往,信里再夹一封信不是个事儿。

□韩石山

有感于世人对徐志摩的误解,一家出版社约我写一本《非才子的徐志摩》。正好赁居京师,陪老伴看孙子,闲着也是闲着,便答应了。“非才子的徐志摩”,这个命题,意思是撇开“风流才子”的一面,专述其平生事业。正如写苏东坡,只写他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”(《自题金山画像》),至于如何的“朝云暮雨”,就全不管了。

起了这个意,过去不会买的书,就得买了。买的书里,有徐善曾先生的《志在摩登》。他是徐积锴的儿子、徐志摩的孙子,书里谈及其祖父的事迹不是很多,刊载的照片,则是他人著作无法比拟的。全书分几部分,真正的传记,只有一百多页。传记中配有照片,凡是重要的,下面都注明“选自徐氏家族影集”。传记之后,是徐志摩的诗选。末后一部分,为“徐氏家族影集”。前前后后,刊出的徐氏家族照片,总在好几十幅。

然而,遍翻之后,发现徐积锴先生单人的全身照,一张也没有。再就是,徐善曾与三个姐姐初到美国,与父母的全家福,也没有。缺了这两张照片,不能说不是此“影集”一个小小的缺憾。

有这么两张照片吗?有。去了哪儿?在我手里。

这就不能不说到我与徐志摩后人的交往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,写罢《李健吾传》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约我写《徐志摩传》,材料收集得差不多了,天津人民出版社又邀我编一套《徐志摩全集》。我对编全集的兴趣更大些,便放下《徐志摩传》的写作,开始编全集的准备。

此前看到陈从周先生的一篇文章,说抗战期间,有个日本记者从硖石镇上的徐志摩故居抄走两册徐志摩的中学日记,带回日本,送给他的一个朋友。这个朋友又将之送给研究中国文学的斋藤秋男先生。1975年,日本社会科学家代表团来访,斋藤秋男为副团长,将这两册日记带到中国,交给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,希望能转交给徐志摩的家人。从后来的事实看,对外友协很负责,将这两本日记交给了在美国的徐积锴先生。

我要编《徐志摩全集》,这两册日记不能不收入。香港版的《徐志摩全集》,是陈从周参与校订的,未收入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托上海的朋友打听,说陈先生已失语,问不出来了。这样,就只有问美国的徐积锴先生了。我去过海宁多次,有朋友在那里,问谁知道徐积锴在美国的住址。有人告诉我,李文哉律师是徐家在海宁的代理人,肯定知道。我与文哉先生有一面之交,去信询问,李先生见是办正事,就告诉了。这样,我便与徐积锴先生有了联系。

起初徐先生不承认有这样的事,想来是人老了,怕麻烦,但是关乎他父亲的事,又不能不答复,就那样说了。我不死心,第二次去信,举了证据,说明两本日记确实在其手里。这次不能不说实话了。说当初要编香港版的《徐志摩全集》,陈从周跟他要,他寄给了陈。中间还出个差错,本该上下两册一起寄的,他误寄了两本下册,陈发现后,他又补寄了上册,并嘱咐陈从周将多余的一本下册寄还他,陈没有办。为这事,老先生颇为生气。

我的《徐志摩全集》,编了好几年。到了2000年,海宁的虞坤林先生告诉我,陈从周去世后,他去陈家吊唁,顺便问起《府中日记》的下落,陈先生的女儿没费什么事,便从书柜的下层格子里找见了包扎得好好的两册《府中日记》。想来是陈先生收到徐积锴补寄的上册后,复印了一份,这

个人记忆

## 与徐志摩后人的交往